

姚鼐与戴震的交往及分歧

朱洪

一

1755年秋天,25岁的姚鼐到京城参加明春第4次礼部会试,认识了戴震。戴震比姚鼐大7岁,休宁人。他虽是穷秀才,但有才华,头一年避祸进京,已小有影响。姚鼐吟诗《赠戴东原》云:“新闻高论诟田巴,槐市秋来步落花。群士盛衰占硕果,六经明晦望萌芽。汉儒止数扬雄氏,鲁使犹迷颜阖家。未必蒲轮征晚至,即今名已动京华。”(《惜抱轩诗文集》,第520页)

在姚鼐看来,戴震口才如齐国辩士田巴,学问如汉代杨雄,下第后困住陋室如同得道之人颜阖,贫不贪财,已具发明六经之萌芽。应聘之车虽晚,人已名动京华。

浙江人喜填词,受其影响,姚鼐一度热衷填词。嘉定人王凤喈(太常)对戴震说:“我过去畏姚姬传,今不畏他了。”戴震问:“为什么呢?”王凤喈说:“他好学多能,见别人有一长处,辄思自己也有。一个人专心一事则精,杂学则粗,因此,他不足畏了。”姚鼐听了戴震转述王凤喈的话,从此不再填词。

1804年正月,外甥张虬御拿出一组姚鼐写的词给舅舅看。重见40年前自己写的词,74岁的姚鼐恍惚隔世,写《题记》说:“真后生龟鉴也。”(《惜抱轩诗文集》,第647页)

一天,姚鼐对戴震说,世上流传的方志,谈古城邑,却不考求四面地形远近,错误很多。他想比较汉县与今地,予以对照,考其沿革,虽不是第一本,也未必翔实,但总比目前流行的地理书强。戴震听了,表示赞成。

1780年夏,姚鼐在敬敷书院写《汉庐江九江二郡沿革考》,末了写道:“东原既丧,无以闻之。”(《惜抱轩诗文集》,第26页)戴震已于1777年去世,见不到此文了。

1788年,姚鼐去歙县主持紫阳书院数月,与秀才方晞原有一面之交。他最初知道方晞原的名字,还是听戴东原说的呢!方晞原学以婺源江慎修为宗,文以桐城刘海峰为宗,是个君子。因有事,姚鼐当年归桐城,来不及去看望他。第二年,方晞原就去世了。姚鼐后来写《方晞原传》,不忘提一下戴震:“余始闻方晞原之名自戴东原。”(《惜抱轩诗文集》,145页)

二

听说纪晓岚要刊刻戴震撰《考工记图》,姚鼐给戴震写信,主张不必急着刻印。《考工记》是先秦人写的书,介绍一些工具等制作方法,文字古奥。戴震一一配上图,欲帮人读懂。戴震次日写回信,婉转拒绝说:“足下以是规教,退不敢忘,自贺得师。”接着说,寻求遗经,有十分之见,有未至十分之见。所谓十分之见,“必徵之古而靡不条贯,合诸道而不留余议,巨细必究,本末兼察。”他的意思,自己写《考工记图》下了功夫,现在刻



姚鼐

印,经得起后世推敲。

姚鼐来信很谦虚,说要拜戴震为师云云。戴震回信说:“至于以仆为师,则别有说,非徒自顾不足为师,亦非所学如足下,断然以不敏谢也。古之所谓友,固分师之半。仆与足下,无妨交相师,而参互以求十分之见。昨辱简,自谦太过,非所敢当之。”言下之意,自己不是不足为师,也不是因“不敏”而谢绝为师,不如作为朋友,二人相互为师。

桐城人自汉代就有尊重年长者风气,所谓“桐乡有余风”。另一方面,桐城人心气很高,不轻易矮人一头,故龙眠山宋明清多隐士。姚鼐20岁中举,已中举5年,给戴震写信,目的是劝他不要急着刻书,身为举人要拜一个秀才为师,只是先扬后规、尊重年长者的过门话。不料戴震说自己不是“不足为师”,叫姚鼐无言以对。姚鼐心气高古,可视为师者寥寥可数。收到戴震的信,姚鼐没有回信,也未将自己给戴震的信收入文集。7年后,戴震于1762年中举,比姚鼐迟中举13年。1763年,姚鼐登进士,再次把戴震甩在身后。

当代人周中明教授认为,戴震此信的态度坦诚、恳切、谦恭,不会因戴震拒绝做老师,而叫姚鼐“心生芥蒂”(《姚鼐研究》,第104页)。这话让人误读,以为姚鼐渴望要拜戴震为师,而不希望被拒绝。周先生是江苏人,或不知姚鼐是一个讲礼节、心气高的人。此外,戴震的信的确“坦诚”,但“谦恭”中却掩饰不住内心的自诩。

1773年,姚鼐与戴震入《四库全书》馆纂修图书。1775年春,姚鼐辞官离开京城,与戴震诀别。他丢弃来之不易的乌纱帽,不是也有不肯低头的性格因素吗?

三

姚鼐与戴震的分歧,根本问题是宗汉学(考据)还是宗宋学(程朱理学)。1774年秋天,姚鼐写《赠钱献之序》,说,明末至今日,学者讨厌陋儒不考古遮蔽近世,于是专求古人名物、制度、训诂等,“其甚者欲尽舍程、朱而宗汉之士。枝之猎而去其根,细之搜而遗其矩,夫宁非蔽与?”因人在京城,姚鼐未点戴震的名字。



戴震

1776年春天,姚鼐在桐城家中写《复蒋松如书》,说:“鼐往昔在都中,与戴东原辈往复,尝论此事;作送钱献之序,发明此旨,非不自度其力小而孤,而又不可以默焉耳。”(《惜抱轩诗文集》,第96页)在姚鼐看来,否定程朱,关系到人心向背,不能沉默不言。因已辞官回里,姚鼐不再隐瞒自己对戴震等人否定程颢、程颐、朱熹的不满。

四

姚鼐辞官归里后,在家细读戴震的《考工记图》校本,写了682字的《书考工记图后》,认为该书“推考古制信多当,然意谓有未尽者”。姚鼐写道:

东原释车曰:“轸谓之收。”此非也。记曰:“轸之方也,以象地也。”盖轸方六尺六寸。记曰:“参分车广之一以为隧。”盖以二尺二寸为舆后,其前也其广如轸,而深四尺四寸,以设立木焉,是为收。……毛公曰:“收,轸也。”谓舆深四尺四寸,收于轸矣,非谓轸名收也。(《惜抱轩诗文集》,第77页)

姚鼐的意思是:戴震解释“车”说,“轸谓之收”。这是不对的。《考工记》说:“轸(车厢底部横木)是方的,如同大地是方的。”“参分车广之一以为隧。”即说车长的三分之一(2尺2寸)为车厢后面的空间,车厢前宽如轸(车厢底部横木),而车厢深(长)4尺4寸,车厢后的空隙用以设立木,叫收。毛公释《诗》说:“收,轸也。”是说舆深(车厢长)4尺4寸,收于轸(比车厢底部横木短),不是说轸名收。

戴震在《考工记图》中关于“车”的解释还有几处错误,姚鼐一一指出。他最后写道:“然其大体善者多矣。余往时与东原同居四五月,东原始始属稿此书,余不及与尽论也。今疑义蓄余中,不及见东原而正之矣,是可惜也。”姚鼐的意思,当年,自己和戴震住一起,他正在写此书,自己来不及和他讨论许多。现在自己提出这些问题,因不能见到戴震本人的意见,是可惜的。

从此文可知,当年姚鼐为什么劝戴震不要急于刊刻此书。1777年5

月27日,戴震去世,生前未见到姚鼐此文。

五

1789年,姚鼐主钟山书院,与闲居江宁的袁枚往来密切。一个夏日,他给袁枚写回信,反对近人诋毁程、朱。他说:“正之可也,正之而诋毁之,讪笑之,是诋讪父师也。且其人生平不能为程、朱之行,而其意乃欲与程、朱争名,安得不为天之所恶。故毛大可、李刚主、程绵庄、戴东原,率皆身灭嗣绝,此殆未可以为偶然也。”(《惜抱轩诗文集》,第101页)

和方苞一样,姚鼐相信因果报应。毛奇龄抨击朱熹《四书集注》,虽活了93岁,损在子嗣。李刚主活了75岁,其子是方苞弟子,得暴病去世。戴震否定程朱,54岁就去世了。“安得不为天之所恶”,指否定程朱,会遭天谴。

1807年12月,77岁的姚鼐给弟子陈硕士写信,认为人不要要求爱好、旨趣等一样,诗佳则专心于诗,文佳则专心于文,能兼自然好,不能兼也不要紧。王引之的小学(文字学)很可贵,其他的才艺差些,可以不论。李光地谈义理可取,谈如何写文章就可笑了。“戴东原言考证岂不佳?而欲言义理,以套洛、闽之席,可谓愚妄不自量之甚矣!”(《惜抱先生尺牍卷六》)“洛”指二程,“闽”指朱熹。

六

1810年9月,80岁的姚鼐写《吴殿麟传》。吴定是刘大槐弟子,参加乡试屡屡落第。姚鼐写道:“歛中学者言经,自江慎修、戴东原辈,大抵所论主考证事物训诂而已,而吴殿麟锐意深求义理,注《易》《中庸》各一编。大概吴殿麟于文及学,其立志都甚高,远出今世。”(《惜抱轩诗文集》,第309页)

姚鼐的意思,歙县江慎修(江永)、戴东原辈仅热心考证、训诂,只有吴殿麟锐意深求义理,立志甚高。

1810年十二月十八日,姚鼐写《程绵庄文集》序。已去世的程绵庄好学深思,缺点是非议程、朱。姚鼐写道:“近世如休宁戴东原,其才本超越乎流俗,而及其为论之僻,则过有甚于流俗者。绵庄所见,大抵有似东原。东原晚以修四库书得官禁林,其书亦皆刻行于世,而绵庄再应征车,卒不用而归老死。其所撰著,仅有留本,不传于世,将忧泯没。斯则所遭或幸或不幸也。”(《惜抱轩诗文集》,第269页)

在姚鼐看来,戴震的书流传未必是幸,程绵庄的书不流传,未必是不幸,因他们都非议程朱。

姚鼐是桐城派的代表人物,戴震是近代批判理学的先驱。二人分歧,表面上是汉学与宋学之争,本质是理学与非理学矛盾。姚鼐怒骂戴震“为天之所恶”“愚妄不自量”,目的是维护封建社会主流意识,而非个人恩怨。